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在北京大学“一带一路”研讨会上的发言

徐洪才，2015年3月29日

大家好！

昨天公布了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这样一个纲领性文件，我们再谈什么，似乎都多余了，但是，机会难得，感谢苏老师给我提供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观点。好在刚才苏老师讲了，这是一个内部讨论会，所以可以自由放开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一个是如何理解“一带一路”；二是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三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哪些挑战；四是谈一点亚投行的事情。

首先，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一带一路”战略，战略这个词容易引起歧义，咱们自己谈战略，但对别人不好谈战略，不好把“一带一路”64个国家都弄到你的战略里面，总体上应该说只是一个“倡议”，或者说是一个“邀请”。大家看到，我的发言题目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战略选择”。显然，我们是实施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战略，因此，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出邀请，发出倡议，号召大家一起来干这件事情。这样理解，可能准确一些。

所以，在这个文件里面是讲愿景和行动。行动方面，更多地介绍我国各个地区都已行动起来了，希望外国朋友也行动起来，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个“要约”文件，我相信会得到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同。从目前情况看，响应的国家越来越多，得到的认可、共识也越来越多，但是不能过高估计、期望能够一呼百应。作为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战略，合乎逻辑的理解，应该说这是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合理延续，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另外，“一带一路”也不是一个机制或组织。如果是机制的话，就复杂了。在文件的背景分析中讲到当今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分化，政策分化，国际规则也在酝酿新的变革，在这一变革时代里，其实有些话并未充分展开讲。比如说，美国正在主导构建新的国际规则，以“两洋战略”为主导的所谓TTP、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等，这些贸易投资新规则的设定，其实中国是边缘化的。

目前，全球贸易增长每年大概3%左右，中国想保持过去那样高速增长来推动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显然不切合实际了。我们提出要有5%-6%的外贸增长，实现起来恐怕也是很难的。目前国内产能过剩，很多产业出现饱和，再加上要素成

本上升，因此，继续依靠外向型模式驱动经济增长已经不现实了。另外，投资也出现饱和了，如低端制造业投资严重过剩；基础设施投资也受制于地方政府负债能力，难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现在是公共产品投资不足，这一块儿的特点主要是投资周期比较长，资金规模比较大，收益比较少，风险比较高，而且有很大的外部性。这种特点，决定了完全依靠私人资本投资显然是不可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倡导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公私合营的PPP模式。今年是我国推广PPP投融资模式的元年，至于落实怎么样，还需拭目以待。从今年1月、2月的经济数据来看，情况不理想，我预计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要掉到6.8%-6.9%左右，投资、消费都在继续下滑，未来可持续发展动力何在？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我们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加速，亚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政治的重心和中心。因此，大家都看到了制约亚太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大多是比较弱的，经济和文化的差异化、多样性，都对深化经济合作形成很大的挑战。中国现在经济体量体量很大，要想继续保持较快经济增长，并迈向全球，现在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从战略空间上看，我们遭遇美国在海洋“三级岛链”设置的封锁。因此，我们利用传统的“一带一路”的概念和精神，弘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其实是契合当今时代发展主题的。

总的来说，外部世界有这种需求，而我们也有这种能力。因此，我们号召和倡议“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同参与，来实现合作共赢的发展目标，同时也为我们自身发展拓展了空间。当然，这个倡议也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要突破美国的重重围堵，要突破重围。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不要陷入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里面去。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动拥抱全球化、融进全球化，并提出这一倡议，是合乎逻辑的。

现在有人提出，在此基础上，能不能再进一步，比如说搞成伙伴关系，叫丝路伙伴关系（Silk Road Partnership,SRP），是否有这个可能？或者再进一步，搞成丝路贸易组织（Silk Road Trade Organization），看来这些更高目标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比较务实的提法，就是“一带一路”不是一个机制，也不是一个组织，

而是一个倡议，仅仅是一个倡议，需要大家心甘情愿，大家能够充分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并最终走向命运共同体。就样，就可以把这一宏伟事业干起来，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当然，对我们内部来说，在960万平方公里内，是可以讲战略的，各地要利用这一契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现在文件里面提到，要利用现有多层次合作机制。其中，有新意和突破的地方是，倡议建立“丝路高峰论坛”。高峰论坛应该是类似G20峰会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对话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定期举办最高领导人、部长级的对话。当然，大家知道G20峰会，在过去几年，在2008、2009、2010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最近几年的作用在递减。特别是，2010年G20峰会提出的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被美国国会一拖再拖，近乎停滞了。前几天我碰到IMF朱民博士的时候问他，拉加德提出的B方案到底有没有，具体是什么内容，能不能拿出来，他说有，但是暂时要保密。显然，通过G20平台来解决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问题，看来是力不从心了。美国作为守成大国，现在肯定要百般阻挠，新兴经济体要保障自身利益合理诉求，因此提出并在建立一些新的平台，像金砖国家银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以及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这些东西作为老的布林顿森林体系的有益补充。现在，我们又提出建立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顺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亚欧非三个大陆之间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历史传承，文化具有多样性，几个世界古老文明都在里面，如何才能实现兼容并包，体现更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实现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适逢其时。当然，这里面更多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愿意尽更多的国际责任，共建“一带一路”也给我们提供了尽责任、发挥更大作用的契机。

对外部来讲，我们提出要建立“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开放性FTA网络，这是习近平主席的提法。请注意，这是一个网络，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伙伴关系。TTP、TTIP都是伙伴关系，如果加上SRP，就是“3P”了，这显然不现实。双边FTA谈判相对容易，可以积少成多，这是务实选择。大家知道，在金砖五国机制下搞出新的“三架马车”，但仍未建立金砖国家FTA，因为这很难。在亚洲地区，我们跟东盟十国搞了“10+1”FTA，日本、韩国也跟东盟搞了“10+1”FTA，为什么“10+3”FTA搞不成？按说三个”10+1”，集成一下就变成“10+3”了，但事实上仍然

未搞成，说明亚洲地区的复杂性。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大家都未提到，西方主导的价值体系对我国政治体制一直有偏见，老是打压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领导力，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平发展之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未来我们能否尽更多国际责任，跟周边国家一起，分享和平发展红利。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将会进一步证明中国具有领导力，从而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所驱动的。

对内来讲，现在各个省市自治区都行动起来，正在对几个方面的战略思路进行整合。一个是所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或者叫三大支撑带；结合传统的东、中、西、东北四个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再结合正在进行的，以新兴城镇化核心，加上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建设。再结合正在推广、复制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成功经验，现在FTZ已推广到了四个，但都是沿海地区。下一步，第三批FTZ试点应该推广到中西部，肯定都与“三大战略”密切相关。比如说，在新欧亚大陆桥这里面，郑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在长江沿线，像武汉、重庆等，还有沿边地区。刚才高教授讲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带，而是若干个带，不仅是陇海线，新疆那边要通向欧洲，也要通向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有铁路、公路，还有空中丝绸之路和Internet网络，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向北，经过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再到莫斯科；也可以通过海参崴到西伯利亚；南边通过云南，到缅甸、孟加拉，再到印度。要对这些沿线节点城市的产业定位、战略定位、经济特色和资源禀赋展开研究，利用“一带一路”发展契机，把新“四化”建设真正落实。

现在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看到了，就是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首先是稳增长，稳增长的核心是稳投资，稳投资靠什么？关键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要到位。仅靠政府资金是不够的，很大地方政府已经囊中羞涩，要发动社会资本、国际资本来共同建设。亚太地区储蓄率比较高，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促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性挑战，从而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我们要内外结合，最终打铁还是要自身硬，还是要把自己事情做好。因为中西部地区经济还很落后，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很大缺口的，这种缺口仅靠这几个平台显然是不够的。亚太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有八千亿美元左右，靠亚投行显然

不够，靠私路基金也不够，最终要通过杠杆，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引导社会资金积极参与。要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把债券市场、股权融资市场发展壮大起来。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五个方面的合作重点，第一是政策沟通。二是设施连通，包括道路、通信设施和油气管网等物理层面的连通。三是贸易畅通，就是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四是资金融通，以前叫货币流通，资金融通更多是讲本币结算，双边货币互换，直接交易，没有讲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老是从自己立场和角度来谈，否则，国际伙伴可能难以接受。最后是人心相通，是指文化的融合。多样性文化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冲突，包括价值观、法律、人文、习俗的冲突，以此来实现战略目标。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国际层面的，西方社会对我们有误解，或者误读，觉得这是中国向外战略扩张，中国威胁论啦，新马歇尔计划啦，这些都对我们形成一种压力。二是相关64个国家的政府层面，能不能理解这个倡议意图，这也很重要。第三个是具体落实，对每一个具体项目，都要有科学、深入的调研、论证，现在整体上还是粗线条的，现在欧亚大陆桥上，我们的货车浩浩荡荡，整车货物送到欧洲，但是回来时候是空荡荡的。项目有没有可行性？是不是说，建好几条高速公路、几条铁路摆在那里好看呢？能不能发挥出经济效益？有没有市场空间？这些都需要扎实研究。西方对亚投行的治理结构、绿色发展，还有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进行百般挑剔，提出质疑。因此，我们不能一哄而起、大干快上，搞出一些烂尾工程，要避免出现这些情况。最后，最大挑战我看还是钱的问题。文化习俗阻碍也是很大的，不同国家轨道标准是不同的，可能要换轨。文化冲突也还没有考虑清楚，比如说，中亚和巴基斯坦那里，有几亿伊斯兰教徒，原来有天然屏障，如果让他们长驱直入，安全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我想谈一谈亚投行。这个事是前几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次提出的，我们理事长曾培炎同志提出思路，后来与外交部及相关部门研讨，最后得到习近平主席认可。这也体现了我们作为新型智库机构对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做出的一点贡献。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好消息，俄罗斯加入了，土耳其加入了，下一步就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加入了，这些国家纷纷向我们靠拢。

如何理解亚投行的战略定位？现在提法是对旧的国际组织的有益补充，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有益的补充，因为现实有需求，旧的平台力不从心，这中

间就出现了矛盾。我们不是要挑战美国的领导权。前一阵子，西方媒体说中国放弃一票否决权，我们财政部副部长讲，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希望，大家有事好商量，力争达成一致。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我最不希望看到“出生未捷身先死”的情况，还是要把事情先做起来。至于控制权问题，我的思考，在建立之初的时候，我们多尽一点责任，让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多出一点股份，是合理的。至于规则，既要考虑GDP规模，也要考虑人口规模，还要考虑亚洲区域内和区域外，内外有别。保障我们领导权、控制权是必须的，不能轻易放弃。如果说要放弃，也要等到美国同意放弃在IMF和世界银行的一票否决权，这是谈判筹码。

美国、日本迟早会进来，我们一直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欢迎他们进来，但给他一个小股东，因为美国在世界银行已经是大股东了，日本和美国在亚洲开发银行已经是大股东了，在一个新的国际组织里面，当一个小股东又何防呢？中国当一回老大，也是和中国现在国际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关于未来亚投行的作用，我相信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出来。亚投行要四两拨千斤，它不可能独自承担所有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因此战略意义更大一些，但是任重道远。

另外，这仅是一个良好开端，还有一些别的机构也在着手建。比如，上合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还有金融合作，现在文件里面提到欢迎境外企业到国内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同时也鼓励国内企业到海外，到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上海国际板市场的建立，要让“一带一路”相关企业能够发行人民币计价股票。建立一个强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很重要的。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在区域内将发挥主导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趋势。我的观点，到2030年，也就是中国老龄化社会来临、农村城镇化基本完成的时候，即城镇化达到70%的时候，人民币要基本实现国际化，这是一个历史任务。资本账户要开放，周小川同志已经讲了，只差最后一公里，很快就完成了。原先一直以为没有时间表，其实是有的，这个时间表就是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倒计时啊，这是国家战略。上海是在岸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双子星座，遥相呼应。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前提，就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没有这个前提，一切将无从谈起。现在区域内，与合作伙伴交易尽量使用双边货币结算，然后在全球布点，形成离岸金融中心，现在RMB

与英镑、欧元已经可以直接交易，与韩元也实现了直接交易，另外，在多伦多建立北美离岸人民币中心，向北美辐射，但是美国暂时还没有进去。到今年年底，人民币进入SDR一揽子货币，这也要争取的。

总之，亚投行承载了很多历史使命，我们寄予期待。我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一些不成熟观点，供大家参考。

谢谢各位！

主持人：感谢二位的精彩介绍！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

提问：我来自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是国际交流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做智库工作，是教授，也是研究员，原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叶静怡主任领导下的经济系做博士后，苏剑教授是我的大师兄，我的导师是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我现在也是要招博士后，希望叶主任、苏所长有好的给我推荐。

我现在向高飞校长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到非洲去的时候，能看到很多中国的标志，可以说中国“走出去”了，高校长也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现在如果按照增长极理论，有一个扩散效应和回荡效应，把这两个效应加在一起叫极化效应。请问高校长，您认为从增长极理论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里面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第二个问题，高校长讲到了，“一带一路”需要强有力领导人，这个观点我很同意，我一直做这样一个课题，政治存活度指数与国家发展，我们的研究结论，政治存活度指数和国家发展是成正比的，什么是政治存活度指数呢？政权的稳固与改革之间是有一定边界的，请高校长回答这样的问题，您现在如何看中国领导人他的领导力，他推进改革和政权稳固之间的边界，您怎么理解？

高飞：这两个问题，我说老实话都回答布勒，我也不是学经济的，里面涉及到的人我也不知道。

关于“一带一路”，中国在这当中起到的作用，这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在设计当中，中国就是起到枢纽的作用，我们不是单纯的由我来主动领导的，但是我是发动倡议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刚才徐老师提到的投资银行，实际上我们在这当中，相当于我们提出一个倡议，大家一起来共商、共建、共享。至于在国内政治和对外经济这方面，中国已经到了很特殊的阶段，胡主席的后期我们就发现

了一个问题，每一个部门的相关领导自己相关的工作都非常熟悉，但是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遇到的问题往往是另外的部门需要帮我解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里面习主席提到了四个全面，倒过来看，从严治党，深化改革，最后实现全面小康，最后达到的就是中国实现自己的全面统筹协调，有这样一个能力之后，中国无论是国内经济的转型，还是对外发展，才能够成功，我是这样理解的。

提问：各位老师，今天听了四位老师的精彩演讲，受益匪浅，我是中国南车研究院经济研究部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几位老师讲“一带一路”政策，我也是收获很多，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在铁路部门，以前的铁道部也待过，后来去了南车，是一家造车的企业，我也亲身经历过一些，比如说中沙项目这些，我比较了解行业内的人他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不是搞经济的，可能比较外行，但可能也是比较实际的问题。

在铁路行业的主导部门看来，“一带一路”政策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和影响呢？我们该怎么去做呢？我们现在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建设能力都已经起来了，实际的问题，回归到本质，你还要考虑到别人的需求，没有钱，又没有工业基础，对于主导部门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于参与的那些企业，比如说铁建，南北车这些单位来说，他们关注的问题，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中沙的轻轨项目，很多土耳其的项目，我们都是赔钱的，而且是巨赔，参与企业也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徐老师刚才说到了轨道的问题，为什么克强总理推出去的时候，我们面临很大的压力，哪怕是我们最优质的产品，也会遇到这些压力的原因，很多是标准的问题。大家讲金融、经济，也是因为规则和标准，涉及到既有的一些规则和标准，我们的轨道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标准的问题，我们业绩是很好，但是人家就不用你的，因为最早制定标准的认不是你，中国是后来的，这但是标准问题并不是说不能解决，像日本，64年搞新干线，他是最早搞高铁的国家，为什么后面高铁没有被日本推出去，因为他的标准是不被欧洲接受的。但是中国有一个优势，有两条技术体系，我们有日本的和欧洲的，有可能将来我们能融合这两个标准体系走出一条路，但是这也需要大的政策支持。因为工业巨头也跟国家经济体一样，也是强势的，也不会轻易让你撼动他的利益。所以，在一个没有需求的地方，怎

么去解决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沿线的，像非洲这些地方，我们帮他发展了，“一带一路”给他留下了什么，会不会最后把他的资源消耗完了，把资源置换完了，你帮他搞开发之后，留下了什么局面，他们更多的也是考虑这些问题。

徐洪才：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也很内行，修一条路，赔本赚吆喝，修得好看，这个路有没有必要？咱们并不是钱多了没地方花，咱们还有很多地方缺钱，很多自己的民生工程还没解决，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考虑经济可行性，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点，要有政治上的考量。最近，我们在斯里兰卡的港口项目搁浅了，建的时候，没有问题，现在政治上轮换了，不一样了，前面的人给你承诺，后面人不认账了。还有宗教因素，安全因素，这些都要考虑。中国人擅长搞计划经济，把自己规划好了，还想规划别人。实际上，一定要坚持市场主导，要在自愿原则 上平等参与，这个问题落实起来非常复杂。这么大规模的投资，靠几个金融机构提供资金，肯定是杯水车薪。有人设想，帮助美国将高铁从西雅图一直修到圣地亚哥，沿岸一路修过去，但是国情不一样，经过每一个地区，老百姓要投票，你影响了人家生活安宁，破坏了环境，他们就不同意你干这个事。再说，美国人喜欢个性化，自己开车到处溜一溜、跑一跑。中国人多，都愿意乘高铁，浩浩荡荡，有这种需求，美国情况不一样。因此，我们必须务实。我们提出“一带一路”FTA 网络，就是从实际出发。很多人说，我们要加入TPP，实际上不是你要加入就加入，而是你不够格，距离人家标准你还差得太远。

再有，你能不能接受他们条件，现在肯定不能，如果接受条件，我们很多产业就会受到冲击。我们为什么要搞自贸实验区呢？就是想先试点，再推广，倒逼改革。事实上，我们还不是国际规则制定者，还是追随者，还没有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这是根本，是立足点。当然，借此契机，我们把国内几大板块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对未来发展形成强有力支撑，这有战略意义。

胡迟：亚投行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的背景，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有这个实力，另一个，中国不满国际经济秩序，是被美日逼出来的，金融话语权没有达到实力的地步，所以导致亚投行。刚才前面发言也说了，龙永图说中国亚

投行是被逼出来的。从未来的发展看，一个是因为是逼出来的，因为有这个需求。我看到数据，亚洲的基础设施，每年八千亿需求，亚洲开发银行一年只能解决一百亿，把世行也加上，缺口是很大的，加上亚投行，缺口仍然很大，钱永远是不够用的。从预测来讲，这个成立之后，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崛起的大国很多，有没有可能以后又冒出类似的银行来。比如说在这中间，既没有说要主导，也没有说要放弃主导，如果我们股本大，肯定是主导。这中间的印度，他现在也很有脾气，所有的新兴经济体中，以后最有可能超过中国的就是印度，它的人口，它的GDP总量，现在国际组织的预测，今年印度的增长率要超过中国，以前发达国家都赌印度要超过中国，他有钱就任性，他可能单独单挑再弄一个什么，未来机构方面的发展演变，我想请徐研究员回答一下，在你的理解方面，有什么变数？

徐洪才：谢谢胡博士，世界经济多极化、国际货币多元化是发展趋势。目前看来，印度起来挑战中国，我估计恐怕还不行，印尼也是人口大国、区域大国，但是也不行。有了这样平台以后，他们也是积极参与的，包括金砖国家银行，也在积极参与，金砖国家银行是各占20%股份，我对其不看好，因为它的治理结构不是那么容易搞定。必须有人挑头，群龙无首，肯定干不成事。你要当老大，就要多尽责任，多多吃一点亏。没有吃亏奉献精神，当不成老大。现在看起来，亚投行也并非庞然大物，注册资本金特就是一千亿美元，实际到位一百亿，当年世界银行成立的时候才十亿美元，那是四十年代。一百亿，我们占50%，五十亿，我们有四万亿外汇储备，才九牛一毛。但是，它的意义不仅在经济方面，更多在政治和战略层面。将来它的作用一定是四两拨千斤，它不是唐僧肉，提供免费午餐，要讲商业回报，就是风险控制、绿色发展，还有公平合理的治理结构，要做成样板工程，难度还是很大的。作为国际组织，它不是商业性质的，如果是商业性机构，就要接受巴塞尔协议和国际组织监管，它是一个开发性机构，要更多体现公益性和发展的价值导向。所以，我觉得中国牵头，在亚太地区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日本也想参与，但他本身并不着急，因为他有一个亚洲开发银行在那儿，暂时不会再成立一个。印尼想单挑，另搞一个也不可能，可以考虑在亚投行里面给印尼安排一个位置。

现在有40多个国家愿意来，美国没参与，这不要紧，他一直在关注我们，美国人是比较务实的，他变得也快，经常变，迟早会参与的。我们要有信心，把这

个搞起来以后，接下来金砖国家银行、上合银行，都要抓紧办。其实这还是不够的，金融体系要加快发展，目前银行体系受到一定冲击，今年存款利率市场化要基本完成。资本账户对外开放也要加快进程，周小川已经说了话的。去年，他讲存款利率市场化两年完成，今年他讲资本账户开放剩下最后一公里，快得很。人民币现在海外规模也是很大的，先把亚洲债券市场做大，通过大量发债融资，把体量做大，现在我们金融市场总体上还是规模太小，特别是人民币的债券市场规模太小，结构太单一，将来人民币在我们区域内广泛的使用，金融体系，直接融资体系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金融市场有先天性缺陷。我们在做海外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中央银行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利用当地现有银行体系，包括信用卡支付等，现在互联网也起来了，将来这一块儿可能发展迅速。人民币规模已经很大了，人民银行是全球最大中央银行，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每年都是相当大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的金融还是深度不够，广度不够，金融市场厚度也不够，还有这些问题，我相信会加速发展，金融作为一个推动力量，会加速发展。但是，想另搞一个组织对我们挑战，暂时不太可能。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徐部长，“一带一路”存在一些政治风险以及经济风险，像斯里兰卡，还有哈萨克斯坦这种国家，存在一种主权违约的话，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风险防范机制，具体有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TPP的规则，这个贸易规则比WTO的规则更严一些，而且在环境和劳工方面都有一些比较高的门槛，我想问一下中国“一带一路”的加入机制，他会有一些什么门槛，中国好象来者不拒一样，任何国家想加入都可以加入。

徐洪才：我只能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高校长回答，这涉及到国际政治关系问题，不是我的专业。

第二个问题，“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合作伙伴关系，也不是什么组织、什么机制，他是松散的，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愿意谈就谈，不愿意谈就不谈，这是它的本质之所在。你想想G20，20个国家在一起谈，20年等一回，当上轮值主席国，现在我们正在酝酿能不能提出一些议题让大家谈一谈，谈完了以后，也没有强制性的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其他组织就不同，比如联合国有章程，还有

相关的国际法，WTO的规则也有约束力，“一带一路”没有约束力。所以，就不能对它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至于国别风险，这个太复杂了，我没有认真研究。

高飞：国别的风险确实很大，刚才您提到的，涉及到一个国家，我们把钱投进去了，最后这个国家涉及到违约，这里面有一个大的前提，只有这个国家在成为失败国家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利比亚，他自己国家都不要了，打成一团糟，钱也还不了了，哪个国家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我自己毁掉，我也毁掉你，这个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刚才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现在在中亚是最稳定的国家，实际上斯里兰卡，还有最近希腊发生的事情，这里面不是别人要发生变化，而是我们对待外部世界的眼光要发生变化。这里有一点，我们长期有一个政策，不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只跟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打交道，这些国家经历了第三次民主制度的浪潮，这些国家的反对党可能随时上台，他并不是针对中国，他要针对以前的执政党，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你长期不行，我才能长期执政，这等于说中国这两次都是躺着中枪的。对于这些国家，我们一方面要和他们的执政党打交道，也要和反对党打交道，另外，所有签订的经济合作合同，是从国家方面来签，而不是针对某一个政党，要淡化政治色彩，而强化经济特色。这里面还有一些，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我讲的时候提到了，一国一策，一定要弄清楚，我们要修一条铁路，经过吉尔吉斯斯坦，经过中亚，我们提出的所有东西，吉尔吉斯斯坦拒绝，我们马上一个反应，这个国家对我们不友好，这么一想就错了。这个国家分成两部分，南方人和北方人势不两立，我们这个铁路经过南方进入，但是北方人执政坚决反对，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他自己。还有一些国家，他国家之间存在很多矛盾，现在大多数看待“一带一路”的时候愿意拿出来一张地图，这个国家怎么样，那个国家怎么样，错，如果这么做的话，一定不会成功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差，比如说中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有时候我们把公路都修通了，从一个国家的首都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开汽车，路很好，可以通过去，一辆车都过不去，因为中间放了一堆土堵住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从一个国家的首都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要到法兰克福转机，到莫斯

科转机，过不去，单纯按我们的想象，如果中国有一天修成了“一带一路”，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恢复了古老丝绸之路的精神，告诉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通过和平合作可以实现共同，不仅是中国自身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也推动地区的融合，这可能是中国将来对世界更大的贡献。

徐洪才：现在全球化浪潮来势凶猛，但是我们准备不足，最大的准备不足就是人才准备不足，人才断档。对64个国家和国别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在70后、80后中几乎没有，大家都忙着学金融，赚大钱赚快钱，没有人研究问题，真正的专家只能从60岁以上人里面找到了。再有一个，长期闭关锁国，虽然去年中国出境游有一亿人次，实际上对人的管理还是很严的。很多人坐在办公室里，拍拍脑门决策，对很多国家没有进行实地考察，就制定一些规划、方案和项目，我看够呛。我们人才储备实在太少了，所以，我建议国家加强这方面的人才培育和准备。现在总体上看，是匆忙上阵，对“一带一路”很多人都能谈一点，大而化之。习主席讲“五通”，我们也只能讲“五通”，讲不出新玩意儿，知识准备，人才准备都严重不足。

提问：我来自文化部外联局，我们的工作是从事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今天有幸听到各位专家，包括提问的各位，也都是非常有针对性，很好的问题。上午几位发言的专家领导都提到了，在内容上或多或少提到了文化的课题。我想请教一下，中国这些年发展起来了，给外界的一个印象，总体上是经济大国，文化上也是一个大国，但是文化上目前承认我们是文化强国的还很少。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一个重要的课题，必须把文化交流往前推，往深推，“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来以后，我们这边也提出来建设“一带一路”，坚持文化先行，因为我们在对外的外交也好，经济的合作也好，进瑞合作也好，在对外的设施建设也好，碰到了很多从经济层面，外交层面，政治层面很难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文化的入口来进行破题。刚才南车的同志也提到了，我非常赞成，外方到底有没有期待，有没有需求，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有这个热情把东西送出去，出现了认识上的落差。刚才高校长也提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战略布局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咱们在经济的全球布局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到文化

的全球布局，在构建全球经济版图的过程当中，是非应该考虑一下全球文化的版图应该如何绘制。如果这两块版图能够沟通起来，关联起来，实现五通的问题，会有更多的破解方式和方法。五通当中提到了人心相通的问题，文化交流其实解决的就是人心相通，人心相通既是“一带一路”的目标指向，也是先行官，先锋队，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文化价值，中国的文化理念，中国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传达什么，需要对方理解我们什么，先给它传递出去，只有对方理解了你的意图以后，理解了你的想法以后，才会消除一些疑虑，会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和可能。刚才徐部长也提到了，这次“一带一路”就是把人类的几大文明勾连起来了，文明上既然勾连起来了，中国在话语权当中，文明的话语权当中会有更多新的设置，也算不上是问题，跟两位专家交流一下。

徐洪才：文化我是外行，“一带一路”包括传统的几大文明，如印度文明、两河文明、中华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等，并没有高低之分，但在交流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新问题，兼容并包是一个正确方向。